



瞭望东方周刊2010015期封面:特供奢侈品

4月14日,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、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、强奸罪一案,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。

此前,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,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,还有无数的名烟名酒、36件现代工艺品、9件文物、69幅字画,曾被人称为“超级震撼”。

2009年,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,结案132808起,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,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,厅局级干部220人,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。

解读高官落马原委,大都是文强式“朝中有人做官,市场有人经商”的故事。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,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。

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~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,结果表明,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,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,名列第一的是“小件奢侈品”。

真材实料的虎骨酒 每条800元以上的天价烟 文物古玩、名人字画、国宝 “特供奢侈品”特在哪儿?

……“贿物”品种三变

改革开放以来,贪官接受的“贿物”历经三变

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20世纪90年代初期,在贪官家称金银、数钞票,要当会计师;世纪之交,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,办案需要“狗仔队”精神;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,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,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。

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“知识化”的需要

字画195件,包括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潘天寿、吴昌硕、任伯年、谢稚柳、弘一、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;

古瓷器23件,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、青花缠枝莲小罐、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、清粉彩花卉过枝碗,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;

西方艺术品4件,鸡血石5块,邮票3本,银圆457枚,金币38枚;

其他各种文物352件,古陶器220件,贵重首饰48件,名酒261瓶……

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,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。

王天义于2002年被判处死刑,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。

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“知识化”的需要,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“年轻化”的需要。

“在中国,这(政府官员)将是一块潜在市场”

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:“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。”

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。

斯蒂芬说,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,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~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。

他坚持认为,在中国,“这(政府官员)将是一块潜在市场”。

贪腐官员拉动奢侈品“创新”

官本位思想主导,升迁的决定权掌握在长官手里,下级不得不巴结上级,这就造成了官场送礼的习俗;而商人经营若得不到官府支持会遇到许多麻烦,商人贿赂官员,官员从中谋利,于是官商勾结。

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鑫说,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,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。

诸如虎骨酒、天价烟和文物等,几乎是为权力“量身定做”,可称为“特供奢侈品”。

……“怪胎”天价烟

烟杂店老板曾经从一盒黄金叶“茗仕之风”中掘出两枚钻戒,还有一条卷着百元大钞的“软中华”

一家不起眼的烟杂店。“有3字头软中华吗?”

店主林老板(化名)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,“早卖光啦,明天赶早!”

这家店位于上海市普陀区。每天下午3时一过,柜台里就插满了“已售完”的小纸牌,能买到的只有“金上海”、“红双喜”等平民烟。

在几乎普遍“生产过剩”的经济环境中,这里是少有的“卖方市场”保留地。买的货越高档,越得求着老板。

有人进门,递上一条“黄鹤楼1916”,说声“先卖着”。林老板老到地瞄了一眼,点头收下。

烟草业似乎成功地“借腐促销”

“天价烟”的叫法,因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而深入人心。

周久耕倒了,天价烟火了。烟草业似乎成功地“借腐促销”。

这个大背景下,林老板的生意更好了。

据他介绍,烟店存的高档货一般分为两块:一块是有进烟记录的,供备查;一块是从其他渠道上货的。

第二条渠道分成两条支流:

一是从“兄弟店”调货,或从外省市串货,“烟的口味地域性较强,一些在外省卖得不好的牌子会被散货到这里,一般加价一成再加一点运费,我们就能拿到本地来卖。”

二是卖“循环烟”。林老板的纪录是将同一条烟卖了三次,送人送掉之后,又被收礼人的太太拿来套现。

“收礼人赚大头,我跟着喝点汤”

林老板说,他这钱赚得提心吊胆,但又心安理得。

“肉食者”无疑是天价烟的消费者。“烟天生是礼品,可自抽,可变现,拿我这儿随时都能换成硬通货,虽然打点折扣,比收现金可安全多了。”

有时候捡漏还能捡着“肉”。林老板练就了一手绝活——掂烟盒。“重量异常意味着有情况。”他说,他曾经从一盒黄金叶“茗仕之风”中掘出两枚钻戒,还有一条卷着百元大钞的“软中华”。他将这个过程称为“淘宝”。

“贵是贵了点,但有很大市场”

如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程永照的定义——超高档烟,才是“天价烟”的学名。

烟草业主管部门按照调拨价的高低将卷烟分成五类,一类烟的档次最高,不含税调拨

价每条500元以上的归入此类。零售价格在每条200元以上的卷烟产品被认为是高档烟。

但程永照认为,200元的区分线已太低。他将每条200~400元的划为“低端高档烟”,“芙蓉王”、“玉溪”等为代表;每条400~700元的为“中端高档烟”,如“中华”、“苏烟”等;每条800元以上的是“超高档烟”,即俗称的“天价烟”。

今年,复旦大学副教授陶明的博士论文已经收尾,他研究的课题是“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”。炙手可热的“超烟”部分在论文中缺失是个遗憾,但他后来想明白了,“天价烟并非应是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,更像是特殊国情下的怪物。”

红云红河集团总裁的一句话反映了生产者的这种欲望,他说:“一支高档烟的价钱等于一碗过桥米线,贵是贵了点,但却有很大的市场空间。”

……“雅贿”的逻辑

古玩送礼,有的以假充真,有的以真当假,不同目的,不同方式,各有各的道

古玩、名人字画、高档艺术品,甚至是国宝,被当作上贡的礼品,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。

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,在其成名作《青瓷》中,着重描绘了这一类“雅贿”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“沟通润滑”的作用。

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,简要概括了“雅贿”的“优势”:隐蔽安全、附庸风雅、充满温情。

“不过,‘雅贿’也是需要一条复杂链条来支撑的。在这个链条里,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‘隐形的翅膀’。”浮石说。

送真古董的有两成就不错了

“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、百货十分利、珠宝百分利、古玩千分利的说法。”郑贺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,专营玉器。30多岁的他入行将近10年。

据郑贺介绍,这个古玩城里卖“老东西”(真古董)的并不多,有两成就不错,其余的基本都是赝品。

郑贺解释说,平时经常来他家淘宝的,基本上都是熟客。“来我家买东西送礼的不多,因为我这卖的都是真古董,价格不菲。”

著名收藏家郭庆祥,如今已是国内收藏界领军人物之一。对于古玩送礼,郭庆祥的看法是“自古如此”,不过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,“不好说”。

“中国的古董就这么多,哪这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?”郭庆祥说,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,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。

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?”郭庆祥说,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,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。

郑贺曾经被一个朋友请去某领导家“鉴宝”,该领导的妻子摆了一屋子“古董”,让郑贺吃惊的是,没有一件是真品。

当他把这一“噩耗”告诉领导时,对方沉吟了一下,镇定地说:“没事,假的也有处理办法。”

“首先,假古董也可以叫艺术品,同样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市场流通;再者,假古董还有另外的多种变现方式。”郑贺说。

古玩店的“潜规则”

据郑贺讲,他有个朋友,也是古玩店老板,就是凭着古玩店的“潜规则”,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。“通常买古玩送礼的,背后原

因都挺复杂,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。送礼的、古玩店、收礼的,各有好处。”

“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,只值几万元,被一个企业家买走,送给了某官员。在买的时候,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,多少天后,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,要卖出这件东西,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,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。”

郑贺说,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。

“这件假古董,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,送给不同的官员,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,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了5次中间费,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。”

郑贺说,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,这样有“钱途”的工作,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。

……谁在消费特殊补品

“循环消化”:“送礼,回收,再卖,生产出来的东西,有时候就在几个当官的家里转圈子。”

“当下官员们最流行的‘养生经’是:早上起床先吃三颗温水泡冬虫夏草,中午两条开水煮辽参,晚上再来碗燕窝。”著名官场小说作家周梅森侃侃而谈他所了解的“官场新潮流”。

在“送礼送健康”的口号下,很多高价保健品和珍贵药材似乎是专为“送礼”而存在的。“有些钱能买到,比如冬虫夏草、燕窝鱼翅;有些有钱也难买,比如虎骨熊胆。”周梅森概括,这些补品可以统称为“特需专供”。

近年来,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多次“侦查”到全国各地存在着一批类似的“特供补品生产线”。一些国家级保护动物制品被非法生产、地下流转,稀有高价(或无价),是这类补品的共同特点。

给官员送礼,要么为升官,要么为发财,越是非法、地下的,越显送礼者“心诚”。“这就催生了一个‘特供’补品市场,官员时兴吃什么,送礼的就送什么,这个市场的起伏,是紧跟官场潮流的。”周梅森说。 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